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第二集

常绍温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第二集

主编

常绍温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庆者 杨芷华 林立平 袁钟仁

粤新登字 01 号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二)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天河石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13 印张 230,000 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18—01143—8/K·258

定价:5.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专题探索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而历史文献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明发展程度的历史标志。我国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整理和研究现存的历史典籍，对于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化，总结我们民族在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成就和历史经验，有着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对历史文献和其他文化宝藏的系统整理研究，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创建与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不可或缺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任何国家的文化不能离开本国的民族传统。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随着民族的产生形成，文化就具有了民族性，并且以民族的形式向前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汉民族的形成，也是与其他民族经过长时期混血、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创造，但由

于汉族文化历史悠久,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是史前文化遗存、口碑传说或有史时期的文字记载,就总体而言,一般都比同时期兄弟民族发生早,发展快,程度也高。即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属有严密规范的文字,甲骨文组成的卜辞则是以占卜形式出现的历史记事。从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到,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纪商殷奴隶社会的经济文化,不仅早于我国境内各兄弟民族,就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也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周代礼制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后世影响更大,可以说,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轨道和面貌;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在思想界放出异彩,使我国古代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夏商周以来的古代文化,都属阶级社会的文化,研究三代以来历代文化发展的过程、成就和特点,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是重要的环节。即如春秋末孔子首创的儒学,成为先秦诸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被后来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变化、内部流派的出现和各朝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学说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已不全同于孔子时代的儒学。不论儒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作为封建时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和学派,后人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历史地位。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传统,就民族这个范畴来说,主要是华夏族——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汉族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兄弟民族或起潜移默化作用,或发生某种形式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它也不断汲取兄弟民族文化乃至外国文化的某些部分,丰富

并更新着自身,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其特出的持续性和凝聚力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传统力量,没有任何外来文化曾经能于取代。

因此,整理研究现存的历史文献、文化典籍,清理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从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澄清两种观点。一是所谓“全盘西化”以及把中国传统文化同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的看法,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者的理论根据之一。全盘西化论者认为西方文化至高无上,抹煞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其腐朽性,特别是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文明对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侵略、渗透。任何国家如果一任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势力长驱直入改变自己,就必定会沦为它的附庸,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血的教训,为此中国是吃过大亏的。我们要学习、引进的西方文化是其中的先进成分,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用的部分,因此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事实上,所谓“全盘西化”,在理论上固然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我国的近现代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重要的是,反对“全盘西化”并不是说我国传统文化中一切都应该继承发扬;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不等于食古不化,搞盲目的祖先崇拜。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容并蓄。”“中国现时代的新文化也

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新民主主义论》)这里,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创造的文化,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取消主义态度,而是应该树立民族的自信心,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我们现在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不应也不能离开民族文化传统的。这是一。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特别是长期封建社会中发展、留存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要运用历史的辩证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既考虑到它们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又要分清何者是民主性精华,何者是封建性糟粕,批判地继承并加以发扬。这里既不是不加分析、不作抉择地兼容并包,也不应混淆概念,把传统文化和封建糟粕划等号,在反封建主义的旗号下对封建社会创造的文化一概打倒,全部抹煞。这就有必要开展“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工作,同时也要求我们对古代文化遗产首先应该保存,而不是消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分析抉择,批判地继承并发扬其精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各有关单位的人文科学工作者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工地进行。我们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即古籍研究所)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小分队,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青年,自1984年冬建所以来,在教委古委会和本校领导的支持下建立起工作队伍,开展工作,工作重点是整理研究古代文

史典籍文献,同时也进行文史哲方面的专题探索。大家认为,这种专题探索有助于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工作,也可说它本身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不揣鄙陋,将探索所得写成专文,汇辑成这本小册子,就教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今后倘条件允许,还拟继续刊行下去,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指正。

常绍温

一九九〇年七月于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目 录

序言	常绍温(1)
考释二题	李 坤(1)
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乐记》	毛庆耆(10)
唐诗中的女子婚恋世界	吴溢球(38)
论赵普	张其凡(53)
论宋高宗朝的分散垦田政策	吕新龙(101)
宋孝宗的内政建设	朱学山(120)
“词家射雕手”——论南宋李昉英《文溪词》	杨芷华(150)
元杂剧语气词“那”、“呢”用法补遗	林广志(175)
陈维崧诗辑佚(续)	陆勇强(186)
张机考	陈 华(198)
试论苏曼殊的爱情诗	陈应潮(201)
源远流长兼收并蓄的广州文化	袁钟仁(216)

道教与岭南“方志小说” 刘 灿(252)

近年来理学与反理学研究综述 ... 纪兴 肖钢(268)

附录:

唐代长安的街西

..... (日本)妹尾达彦著 林立平译(280)

陈抟与麻衣道者——“若水见僧”传说之辨析

..... (日本)竺沙雅章著 昆仑人译(316)

后记 常绍温(331)

考释二题

李 坤

一、《春秋》始记自鲁隐公考

孔子作《春秋》为什么要始记自鲁隐公呢？自己研习有点滴之见，在此提出来讨论，以求抛砖引玉。

（一）问题的提出

1. 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前人有诸多论述。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①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②上述两条史料都涉及一个问题，即孔子的《春秋》是有感于“周道衰废”和“道之不行”而作。孔子也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③。其实，孔子作《春秋》也是反映这一时代变化的。而“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在公元前

770年周平王被迫东迁时就已经出现了：“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④但孔子作《春秋》为什么不从与周平王东迁时间上接的在公元前768年即位的鲁惠公开始，而要从公元前722年“摄政”的鲁隐公开始呢？

2.《春秋》于鲁隐公非“公”摄位而序以公位，且以之作为反映春秋时代变化的鲁史的第一公来记载，其目的又何在？

（二）对《春秋》始记自鲁隐公的考证

1.《春秋》、《左传》对鲁隐、鲁桓的记载及评价充分反映了孔子《春秋》始记自鲁隐公的目的是为了尊“名分”，倡“礼让”。《左传》开篇就直接清楚地叙述了鲁隐公与鲁桓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见鲁隐公的恪守“名分”、磊落正大：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⑤“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⑥于隐公母“君氏”和桓公母“夫人子氏”之死，《春秋》记事取直述的原则：“十月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⑦“夏四月辛卯，君氏卒。”^⑧但也存其“名分”，“夫人子氏”为“薨”，“君氏”为“卒”，行文中表现出其对鲁隐公尊名分守礼制的褒扬。而《左传》记述此事时其好恶之情直遣笔端：“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⑨直叙其事，而于“夫人子氏”（桓公母）之“薨”却无一言半语之记载。可见《左传》对隐公恪守“名分”、礼让为国之推重及对桓公之蔑视，不为无由。遍览《春秋》、《左传》所记隐、桓之事，大多褒隐而贬桓，且都侧重于“名分”及礼让为国方面。《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

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穷氏，立桓公，而讨穷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春秋》桓公二年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象这类事情的记载在两书中还多次出现。可见，《春秋》和《左传》是推重、褒扬鲁隐公恪守名分、礼让为国而贬损鲁桓公的非礼行为的，也充分表现了《春秋》始记自鲁隐的目的所在，从而对《春秋》为什么要始记自鲁隐，且非“公”而序以公位就不难理解了。

2. 从《史记》对鲁隐、鲁桓的记述及评价亦可见《春秋》始记自鲁隐的用意。“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斋于社圃，馆于穷氏。挥使人弑隐公于穷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⑩《史记》于鲁隐、鲁桓之事取直述其始末的方式，谁优谁劣、谁憎谁爱，便一览无遗。司马迁且感叹道：“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强，鲁乃不昌。”^⑪从以上这些记载及评价亦可见司马迁对隐公恪守名分、礼让为国之褒扬及对桓公之不礼和其后代三桓“争强”之讥评，且认为是“鲁乃不

昌”的原因。从而证明司马迁也是窥见了孔子作《春秋》始记自鲁隐的目的。

3.《春秋·谷梁传》说：“桓公内杀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⑫

4.杜预说：“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⑬也把隐公“让国”作为《春秋》始记自鲁隐的一个主要原因。

5.司马光则以提问的方式写道：“问：《春秋》始隐之说，谁氏为通？问：《春秋》不书公即位，何以特书‘王正月’？”^⑭虽然未见司马光对此作出解释，但其所著的《资治通鉴》记事始自三家分晋，认为君臣的名分紊乱了，就会出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而国将不国的局面^⑮。可见司马光也是深明孔子作《春秋》不书公即位，然而却“特书王正月”的深刻用意的。

6.孔子作《春秋》始记自鲁隐公以正“名分”，以倡“礼让”，也是符合其本人的政治思想的。“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⑰“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⑱“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⑲

从以上的论证，可以看出，孔子所作的反映春秋一代“天下无道”的发展变化的史著《春秋》，其所以始记自鲁隐公，是出于其正“名分”、倡“礼让”的目的的，也可以说是其著史的匠心独具，于此亦可认为是孔子著《春秋》的有力证据之一。

二、《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的阐释

孔子《论语》“先进于礼乐”章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古今人对这段话的阐释颇多，我认为尚没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孔子的原意。在此谈下自己的看法。

（一）首先要弄清楚孔子所说的“君子”“野人”的含义。

我认为，孔子所说的“君子”“野人”主要是就人们的修身养性和“生性”方面说的。虽与社会阶级、等级有很密切的联系，但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其实这里所谈到的“野人”，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经常说的“小人”。在这里，“野人”一词是与“君子”相对而言的。下面我们就这整段话的意思来看，就不难理解了。孔子对“君子”“小人”是怎么划分的呢？

1. 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尺度。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君子晓于大义，而小人只是盯着眼前的利益。“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②君子讲求修身和行礼的一致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③所谓“求诸己”，是指君子积极主动地进行个人的身性修养，而小人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求诸人”，由别人来管束。故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⑤仁，是孔子认为君子修身养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孔子认为仁还有爱人、达人、博施于民而济众等意义，因与本文无关，故略。），一般人是很难称得上仁的。孔子也不敢自称为仁。但小人是绝对不能达到仁的境界的。可

见，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主要以修身养性为尺度是明白无疑的。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证明孔子所说的“君子”“野人”（亦即“小人”）和社会的阶级或等级关系并非完全等同。孔子说自己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②；其弟子颜回经常过着“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生活^③；子路“衣弊缊袍”^④；公冶长曾“在縲紲之中”^⑤；仲弓父亲是“贱人”^⑥。尽管如此，孔子并没有把自己及其许多名弟子摆在“野人”之列，而自认为“君子”。

2. 孔子认为“君子”“小人”是由他们的“生性”决定的。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⑦“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⑧“惟上知与下愚不移。”^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这些言论都极其露骨地表现出了其落后腐朽的“血统论”和“命定论”思想。对此，我们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由上可知，孔子所说的“君子”是“生而知之者”，至少是“学而知之者”，他们生性聪慧，又能积极主动地进行个人身性修养，因而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上的统治者；而“小人”生性愚蠢，“下愚不移”，又不能主动进行个人的身性修养，只能“求诸人”，因而只能成为被统治者；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可见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主要是就修身养性和“生性”方面而言的。它和社会的阶级或等级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两者又不是完全等同的。“贱人”、“縲紲”者只要“生性”好，又能够积极主动进行个人的身性修养，应属于“君子”之列。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野人”的基本含义。

(二)“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既然君子无论其为“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是社会上理所当然的统治者，那么，“礼乐”制度由他们制定并颁行该是顺理成章的了。但孔子却说君子“后进于礼乐”，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它是孔子有关修身养性的“仁学”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⑤“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⑥孔子这一系列言论都是就君子修身养性而说的，即是首先要“求诸己”，“义以为质”，“先难”，“克己”，然后才是“礼以行之”，“后获”，“复礼”，即“后进于礼乐”。这样才能够做到表里如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⑦，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就是孔子“后进于礼乐，君子也”的全部意思，也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基本含义之一。而“小人”由于不能“求诸己”，“卜愚不移”，那就只好先进于礼乐，“求诸人”，接受君子制定的“礼乐”的约束了。《论语·颜渊》有这么一段话，可作这个问题的注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三)“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如要推行礼乐教化，我还是提倡对“野人”要进行灌输的。这里并没有丝毫贬“君子”褒“野人”的意思。它恰好体现了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私人教育家，所具有的远大眼光以及其思想的丰富性。虽然孔子认为“小人”不能够“求诸己”，不能够主动自觉地进行个人的身性修养，但只要“先进于礼乐”，接受礼乐的教育和规范的约